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4.007

论朱利安·巴恩斯的法国情结与 英格兰性反思

李颖,李会芳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朱利安·巴恩斯的多部小说以法国为重要参照界定和反思英格兰性。在法国情结的影响下,他笔下的英格兰人在性格、思维和艺术审美等诸多方面与法国人存在明显差距,处于劣势一方,这与英格兰的传统自我认知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巴恩斯的法国情结并非意在“法国化”,而是为了反思传统英格兰性的狭隘和局限。通过“跨越写作”,巴恩斯将法国文学和文化影响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在坚持英格兰文学民族个性的同时,创作出风格独特的作品,实现了文学上的创新和突破。

关键词:朱利安·巴恩斯;法国情结;英格兰性;反思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4-0045-07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格兰性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之一,它不仅在历史社会科学领域引发广泛讨论,也成为文学和艺术的重要议题。英格兰性之所以广受瞩目,是因为它关涉英格兰民族身份认同这一焦点性问题。当代著名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创作始终关注英国社会的当下问题,对英格兰性的思考一直渗透于其文学创作之中。国外学术界对巴恩斯小说的英格兰性书写的研究大都以个别文本,尤其是《英格兰,英格兰》为研究对象,结合真实与虚构、记忆与历史等讨论英格兰性的想象和建构问题^①。这些讨论对于理解巴恩斯小说与英格兰性不无裨益。但还应该看到,巴恩斯的英格兰性书写主要是以法国为参照进行的,法国文学文化和民族特性更是他构建和思考英格兰性的关键所在,遗憾的是,国外学界关于这一话题鲜见讨论,国内学者^②虽有所涉及,却又缺乏深入探讨。本文以文本细读为基础,探究巴恩斯的法国情结对其界定和反思英格兰性

的作用和影响,揭示其英格兰性书写的精神实质。

在论述之前,需要就“英国性”和“英格兰性”略加区分和说明。一般而言“英国”的英文是“The UK”或“Britain”,与“英国性”对应词的是“Britishness”,而“英格兰”英文为“England”,“英格兰性”为“Englishness”。近年来,国外学界主要讨论的是“英格兰性”。有学者指出英格兰的民族意识觉醒于19世纪后期,因为之前英格兰主要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无暇对自我身份进行思考,而19世纪后期,英帝国开始衰退,英格兰的民族意识被唤醒,开始从语言、文化和历史意识等方面对英格兰进行民族塑型,形成了英格兰民族认同的基础^③。二战之后,英帝国进一步衰败,内部权力不断分化,英格兰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削弱,英格兰民族认同问题更加凸显,英格兰性的讨论也日趋热烈。从文学观之,当代英国小说“民族叙事更多地表达英格兰性、爱尔兰性、苏格兰性和威

收稿日期:2020-03-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WW054)

作者简介:李颖(1968—),男,云南宣威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BentleyN. “Re-writing Englishness: imagining the nation in Julian Barnes’s *England, England* and Zadie Smith’s *White Teeth*”, *Textual Practice*, 2007, 21(3): 483-504. BerberichC. “England? Whose England? (Re)constructing English identities in Julian Barnes and W. G. Sebald”, *National Identities*, 2008, 10(2): 167-184. Cohen-HattabK, Jenny K. “Literature,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Limits of Authenticity: a Composite Approach”,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6(2): 57-73.

^②王一平:《作为“他者”的“自我”——“他者”观照下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的“英国性”书写》,《外国文学》2018年第2期。

^③Kumar K. *The Making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3, pp. 117-225.

尔士性等文化身份认同。”^①值得注意的是,巴恩斯本人也谈到英格兰的民族认同问题,他说:“关于英国人(the British),尤其是英格兰人(the English)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他们弄不清英格兰人的含义……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一直以英格兰人为参照定义他们自己,而英格兰人则不知道以谁来界定自身,他们不知道是否以法国人为参照——常常是法国人”^②。巴恩斯不仅区分了“英国人”和“英格兰人”,还指出了英格兰自我认同的困惑和焦虑。英格兰性也成为其小说关注的问题。

一 巴恩斯的法国情结

巴恩斯对法国有一种超常的偏爱,他不仅自称是“一个深爱法国的中产阶级英国作家”^③,还将法国视为“第二故乡”^④。他这一偏好,业内也是公认的,法国评论家杰哈·穆达尔曾经说过巴恩斯“在当代英国作家(British authors)中最亲法,这是毫无争议的”^⑤。我们常把某种超乎寻常的思想状态称为情结,如恋母情结便是儿子对母亲超出寻常或不正常的依恋或爱恋,由此,可以把巴恩斯对法国的那种超常的偏爱称之为法国情结。

巴恩斯与法国的渊源源自家庭的教育和熏陶。像其小说《有话好好说》的主人公奥利弗的父母一样,巴恩斯的父母都是法语教师,他们非常喜欢法国,并且将这种情感传递给了儿子乔纳森和朱利安,给他们“早早就打上了法国烙印”^⑥。他们不仅教两个儿子法语,把法语作为家庭用语,而且从1959年即巴恩斯13岁开始,每年都驾车带他们去法国度假。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非常少见,因为那时英格兰人很少去法国。巴恩斯是班里第一个去过法国的学生,法国也是巴恩斯“十八岁以前到过的唯一欧洲国家”^⑦。父母的影

响和法国的度假经历无疑激起了巴恩斯对法国的兴趣,滋养了他的法国情怀。在以后的生活中,去法国旅游度假也成了巴恩斯的生活常态,而且他选择的去处与父母一样,不是巴黎或其他大城市,而是人口较少的区域。这些安静而有活力的乡村深深地吸引了他,那里“锈迹斑斑的咖啡桌、午餐时的慵懒、修剪过树冠的梧桐树、滚木球游戏中沾满灰土的球撞击发出的响声、万能的杂货店”^⑧令他流连忘返。巴恩斯喜欢品尝当地的美食,还是鉴别葡萄酒的行家。

对法国文学和艺术的喜爱是他爱上法国的又一主要原因。巴恩斯十四五岁开始阅读法语著作,大学时代,巴恩斯阅读过波德莱尔、魏尔伦、纪德和萨特等作家的作品。他喜爱蒙田、都德、左拉、加缪,对福楼拜更是推崇备至。他的成名之作《福楼拜的鹦鹉》其实就是对福楼拜的献礼,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奇特的小说就是一本福楼拜传记。巴恩斯还将喜爱的作家作品译成英语,介绍给英国读者。在为写作《福楼拜的鹦鹉》做准备时,巴恩斯读到都德记录自己与梅毒斗争的《痛苦之地》(*La Douleur*),震惊于其直率的风格和坦诚的勇气,将之视为佳作,并于2002年把它译成英语。法国艺术也让他着迷,他发表过多篇文章探讨法国画家,其中包括库尔贝、马奈、德加、雷东、马蒂斯等,2015年他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名为《论艺术》(*Keeping an Eye Open: Essays on Art*)。巴恩斯曾经说过:“一个国家重要的性格体现于它的外交政策、正式建筑及其伟大的作品之中。”^⑨他自己正是通过文学和艺术等文化形态认识和了解法国,并深深爱上了这个国家。

巴恩斯毫不掩饰自己对法国的偏爱。在一次采访中,他说:“于我而言,法国人根本不是敌

①杨金才:《当代英国小说的核心主题与研究视角》,《外国文学》2009年第6期。

②FragaX. “Interview with Julian Barnes”. *Conversation with Julian Barnes*. Ed. Vanessa Guignery and Ryan Roberts.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2009, pp. 141-142.

③MoseleyM. “Crossing the Channel: Europe and the Three Uses of France in Julian Barnes’s *Talking It Over*”. *Julian Barnes*. Ed. Sebastian Groes and Peter Childs.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p. 71.

④KovalR. “Big Ideas—Program 5—‘Julian Barnes’”. *Conversation with Julian Barnes*. Ed. Vanessa Guignery and Ryan Roberts.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2006, p. 127.

⑤MoseleyM. “Crossing the Channel: Europe and the Three Uses of France in Julian Barnes’s *Talking It Over*”. *Julian Barnes*. Ed. Sebastian Groes and Peter Childs.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p. 71.

⑥KovalR. “Big Ideas—Program 5—‘Julian Barnes’”, *Conversation with Julian Barnes*. Ed. Vanessa Guignery and Ryan Roberts.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2006, p. 127.

⑦KovalR. “Big Ideas—Program 5—‘Julian Barnes’”, *Conversation with Julian Barnes*. Ed. Vanessa Guignery and Ryan Roberts.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2006, p. 127.

⑧GuigneryV. “‘A preference for things Gallic’: Julian Barnes and the French Connection”. *Julian Barnes*. Ed. Sebastian Groes and Peter Childs.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p. 39.

⑨Barnes, Julian. *Letters from London 1990—1995*. London: Picador, 1995, p. 81.

人……他们是有政治智慧的人。”^①他甚至将英法之间的敌意归结于英国的岛国心态,并向法国人解释说:“真不是你们……只是你们不仅是你们,你们已经变成了所有外国的象征;一切,不仅是法国性,从加莱就开始了。你们环顾边境,可以有四个伟大文明的选择,而我们在对面的岛上,一面被你们包围,另外三面是海。难怪我们对你们的感受比你们对我们更强烈。”在他看来,“英国人(the British)因法国人而担忧,而法国人只是被英国人所纠葛。当我们爱他们时,他们以理所当然的态度而受之;当我们恨他们时,他们困惑而恼怒,但说句公道话,问题出在我们,而不是他们”^②。

巴恩斯的小说更是其法国情结的见证。在他多部小说中或多或少都能发现法国元素,如法国城市、法国人物、法国事件、法语等几乎都是巴恩斯小说的标配,这种偏好在英国作家中是极为罕见的。并且巴恩斯在刻画那些与法国关联紧密的人物时,不仅显得更为得心应手,而且总要把这些会说法语、喜欢法国文化的人物塑造成为小说中最为幽默风趣、敏锐健谈的角色。这些人物也因此成为小说中最为鲜活生动的塑造,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地铁通达之处》的主人公克里斯、《有话好好说》中的奥利弗等都是如此。他们实质上与巴恩斯一样都是亲法者,克里斯甚至被认为是巴恩斯的自画像,他虽然生活于伦敦市郊,却十分喜爱法国语言、文学和艺术,年少时经常与班里最要好的小伙伴托尼谈论巴黎或讨论法国文学,并把文学作为自己难以割舍的梦想和追求,恰如生活中的巴恩斯。值得一提的是《有话好好说》和《爱及其他》中姬利亚的母亲维亚特,她是法国人,更是小说中法国元素的集大成者。她虽不是小说的主人公,出场机会也不多,但她思维敏锐、风趣浪漫,几乎每次出现都是一次法国思维和法国文化的展演,魅力十足。从某种意义上说,姬利亚的魅力就是法国文化的魅力,也即法国对于巴恩斯的吸引力。

巴恩斯不仅借助于小说人物之口表达对法国的赞赏,而且有意回避可能损害法国形象的事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地铁通达之处》。这部小说第二部分的题目“巴黎(1968)”很容易激发读者的某种想象,因为1968年的巴黎是与那场被称

为“五月风暴”的重要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在这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中发生了暴力冲突,其他英国作家很容易把它作为法国人“粗鲁和暴乱”的例证来呈现,但巴恩斯则不然。他安排了一场异国之恋,让主人公克里斯与法国女孩阿里克相爱,从而淡化了这场惨烈的运动。谈起这个事件时,叙事人克里斯说:“我在那儿,整个五月都在那里,烧毁股票交易所,占领沃德恩,占据比扬库尔,夜里从德国轰隆隆开回坦克的谣言,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都在那儿。但实际上我什么都没看见。坦率地说,我记不起天空有过乌黑的烟痕。”^③有评论认为这是巴恩斯强调个人历史、质疑宏大历史的一种安排,这虽然不无道理,但结合他的法国情怀观之,不难看出,巴恩斯的这一出人意料的处理,有维护法国形象的嫌疑。

法国情结对巴恩斯的影响是深刻的,采访中他也经常谈到与法国的亲密关系,强调法国文学和文化等因素对自己的影响。可以说,法国情结不仅仅只是巴恩斯对法国的偏爱,它已融入了巴恩斯的创作中,并且参与了他对自身文化的审视,包括对英格兰性的反思。

二 反思的英格兰性界定

约翰·托什(John Tosh)指出:“认同,尤其是本身具有不稳定因素的认同,常常都要依赖一个被妖魔化的‘他者’的在场,‘他者’具备所有与自我所渴望拥有的那些优点恰好相反的特征,而且总是依附于现实生活中最近的人身上。”^④对于英格兰而言,这个“他者”和“最近的人”就是法国。在英格兰的传统自我认知中,法国是被妖魔化的一方,总是与残暴、纵欲、腐败、浮夸等负面意义联系在一起,而英格兰则是美好的象征,常与绅士、和平、公正、克制等正面意义紧密关联。巴恩斯的英格兰性界定也以法国为参照,但受法国情结影响,在他所确立的英法二元对立中,法国主要在正面意义上得到定义,而英格兰则多在负面意义上被辨识和界定。他尤其强调与法国人相比,英格兰人在性格、思维和艺术修养等方面所体现出的劣势和差距。

在民族性格方面,法国人热情、善良,而英格

^①KovalR. “Big Ideas—Program 5—‘Julian Barnes’”. *Conversation with Julian Barnes*. Ed. Vanessa Guignery and Ryan Roberts.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2006, p. 128.

^②MoseleyM. “Crossing the Channel: Europe and the Three Uses of France in Julian Barnes’s *Talking It Over*”. *Julian Barnes*. Ed. Sebastian Groes and Peter Childs.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p. 72.

^③Barnes J. *Metroland*. London: Picador, 1990, p. 86.

^④ToshJ. *Manliness and Masculinit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Essays on Gender, Family and Empire*.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td., 2005, p. 49.

兰人则冷淡、粗鲁,这是巴恩斯小说中英格兰人自我认知的共识。《生活的层级》里,英国皇家卫队上尉及飞行协会成员弗雷德·伯纳比通过热气球飞行的经历,发现“法国农民比英国人更善良,更礼貌”^①,在他降落的地方,农场主不仅留他在家过夜,还为他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而且村里的医生和屠夫还带来了香槟酒,席间,“医生提议为共同的兄弟情举杯”^②。法国人的热情好客让伯纳比感动不已,他不得不承认“热气球在诺曼底着陆确实比在艾塞克斯好”^③。《福楼拜的鸚鵡》中,G.M.马斯格雷牧师认为“法国海关官员的行为像绅士,彬彬有礼,而英格兰【英国】^④海关官员是无赖”^⑤。与法国人的热情相反,英格兰人是冷淡的。小说《英格兰,英格兰》将“冷淡”视为英格兰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并把它列于最能体现英格兰性的50个事物排名的第21位。小说中的老英格兰因封闭、狭隘、冷淡而衰败,而“英格兰,英格兰”则主动求变,与国际接轨,改变了冷淡的态度,巴恩斯写道:“在这里,你将感受到国际上的那种友好,而不再是传统冷冰冰的英格兰式欢迎”,“你是愿意成为那个困惑的人,顶风站在肮脏的老英格兰城区的路边,弄不清该往哪里走,而其他的人擦肩而过,视而不见,还是成为被关注的对象”^⑥。

艺术修养和审美是巴恩斯界定英格兰性的又一重要参数。关于英格兰人的审美问题,乔治·奥威尔曾指出:“艺术能力的缺乏,这可以说是英格兰人(the English)外在于欧洲文化的另一种说法。”^⑦巴恩斯小说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福楼拜的鸚鵡》的叙述人布莱斯维特这样对比英吉利海峡两边的艺术家:“沿着诺曼底海岸有不少艺术馆,进去看看,你会发现,本地的画家一遍又一遍地画这样的景色:那北边的风光。一片海滩,大海,还有变幻无穷的天空。拥挤在黑斯廷斯或马盖特或伊斯特本的英格兰画家【英国画家】,眼睛盯着性情乖戾、单调乏味的海峡,从来画不出类似

的景象。”^⑧在小说集《跨越海峡》的《干扰》(“Interference”)篇里,英格兰甚至成了艺术的死地。主人公利奥纳德为了追求艺术梦想,离开英格兰去了欧洲,并取得了艺术事业的成功,在他眼里英格兰与艺术无缘:“在英格兰,他们的双耳间就像有雾一样。他们想象自己谈论的是艺术,但其实他们只谈论趣味。他们对艺术没有概念,对艺术家的需要也没有概念”;“在英格兰要成为艺术家是不可能的。你有可能成为画家,或作词家,或者是某种涂涂抹抹的人,但是那些一头雾水的大脑不明白成为艺术家的先决条件”^⑨。在小说《地铁通达之处》中,巴恩斯还特意设计了一个场景来体现英格兰艺术品味的低下:主人公克里斯20世纪60年代到巴黎做研究期间,因爱慕居斯塔夫-莫洛的艺术,多次参观莫洛博物馆,一次他遇见三位英格兰同胞,听见他们谈论莫洛的画作,他们对莫洛的评价与他的观点大相径庭,于他而言,莫洛作品“引人入胜”“令人称奇叫绝”,但他的同胞显然“缺乏艺术鉴赏力”,其中一位竟然用“手淫者的艺术”^⑩来评价这位法国艺术大师的作品,这让他难以接受。

巴恩斯尤其强调英格兰和法国思维的差异。具体而言,英格兰人善于具象思维和处理具体事物,而法国人擅长抽象思维和理论。巴恩斯小说中的英格兰人将自己与法国人区分开来,同时对法国思维赞赏有加。在《地铁通达之处》中,叙述人克里斯在巴黎做研究期间与法国女孩阿里克相识相恋,在相处过程中他们很快便注意到英法思维的差异:“法国人处理抽象的、理论的、总体的事物;英格兰人(the English)处理具体的、外表的、附加的、特例的、个性的。”^⑪克里斯羡慕阿里克,认为她体现了“法国式的良好教育,把握理论就像她用叉子取面一样容易,引经据典支持自己的观点,很自信地在各流派间穿行”^⑫。在巴黎一段时间之后他自己也受法国思维的影响,变得

①Barnes J. *Levels of Life*. London: Jonathan Cape, 2013, p. 7.

②Barnes J. *Levels of Life*. London: Jonathan Cape, 2013, p. 9.

③Barnes J. *Levels of Life*. London: Jonathan Cape, 2013, p. 7.

④文中 English 和 British 的翻译与所用译本的翻译有差异,【】中为原译本翻译,后文均如此标注。

⑤朱利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鸚鵡》,石雅芳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页。

⑥Barnes J. *England, England*.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8, p. 184.

⑦Orwell G.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Socialism and the English Genius*.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62, p. 24.

⑧朱利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鸚鵡》,石雅芳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⑨Barnes J. *Cross Channel*.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6, p. 12.

⑩Barnes J. *Metroland*. London: Picador, 1990, p. 126.

⑪Barnes J. *Metroland*. London: Picador, 1990, p. 118.

⑫Barnes J. *Metroland*. London: Picador, 1990, p. 118.

“更具有总体性思维了”^①。《透过窗户》(*Through the Window*)是巴恩斯的论文集,但其中却有一个小故事——《向海明威敬礼》(“Homage to Hemingway: a Short Story”)。故事的主人公赫尔应邀到欧洲教授文学和写作,他深刻体会到欧洲人与英格兰人在思维方面的差异和优劣:“他们对抽象和理论的那份自然与轻松使他的英格兰实用主义(the English pragmatism)好像成了草率的思维。”^②《福楼拜的鹦鹉》的叙事人布莱斯维特也把自己寻访福楼拜写作《纯洁之心》用过的那只鹦鹉的举动,归结于英格兰人注重具体的思维方式,他说:“如果你是一名法国研究人士,你也许会说,鹦鹉是罗格斯的象征(un symble du Logos)。作为英格兰人(being English),我急忙返回到有形的物质上:回到我在主宫医院里见到的那只体态娇美、自鸣得意的生物那里。”^③而在小说《有话好好说》以及《爱及其他》中,巴恩斯对姬莉娅的母亲维亚特的塑造,也着重强调她的法国思维,有意突出其深邃而富于哲理的思考。

此外,与法国人相比,英格兰人对历史态度消极,缺乏反思。在小说《亚瑟与乔治》里,主人公之一的乔治通过英格兰与法国的对比,总结了英格兰对待历史的态度:“在这里,时常会爆发公众骚乱,群情激愤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会导向暴力和不公正,但很快这些都会消失在记忆中,鲜有在国家历史上留有痕迹。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就让我们忘掉,回到从前的日子去吧:这就是英格兰【英国】方式。”^④他认为这种“英格兰方式”导致了自己的默默无闻,不能像在法国蒙受不白之冤的德雷福斯那样闻名于世。事实上,乔治有关英格兰人对待历史的认识,就是巴恩斯本人的观点。巴恩斯写作《亚瑟与乔治》是受到了道格拉斯·约翰逊的启发,这位法国历史学家提醒他关注英格兰大沃利的乔治案与法国德雷福斯案的相似性。但巴恩斯不仅看到了两个冤案背后的种族主义成因,更从两个国家对待案件的态度看到了两个民族的差异:“我认为两个案件道出了两个国家的不同。法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积极主动。而在英国(in Britain),我们不这样。”^⑤他尤其强调英格兰人对历史缺乏反思,他说:“在法国他们

喜欢敞开旧伤口,可以说,他们喜欢记住历史是常态,就像英格兰人忘记历史是常态一样。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将会长记性,因为英格兰人对他们不那么好。”^⑥巴恩斯创作《亚瑟与乔治》这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意在把乔治案从历史的尘封中解放出来,提醒英格兰人关注 and 反思历史。

巴恩斯作品中的英格兰与法国的对比俯仰皆是,彰显了英格兰与法兰西的种种差异。通过这些差异,巴恩斯不仅界定了什么是英格兰性,同时也充分暴露了英格兰在民族性格、艺术修养等诸多方面的差劣。因此,巴恩斯的英格兰性界定是对英格兰传统自我认识的批判,以及对英格兰传统贬抑法国行为的矫正。

三 “跨越海峡”——英格兰性的突破与坚守

巴恩斯的英格兰性反思不仅只是发现差异,更是要寻求改变以突破英格兰性的狭隘和局限,打破传统的英法民族认同的敌对和僵化模式,他的“跨越写作”便是这样的尝试。巴恩斯小说有各种形式的“跨越”,这其中有英法边界的跨越,如《地铁通达之处》中的克里斯多夫、《福楼拜的鹦鹉》中的叙事人布莱斯维特、《有话好好说》中的斯图亚特等,他们都跨过英吉利海峡与法国文化遭遇,但更主要的“跨越”方式当属巴恩斯英语写作中对法语的运用以及对法国文学的借鉴。

法语的使用是巴恩斯小说的常态。他笔下的人物有些是法国人,适当地用一些法语词汇和语句作为他们身份的标识并不足为怪,但巴恩斯小说中的英格兰人也有使用法语的习惯,例如《地铁通达之处》的主人公克里斯和托尼,以及《有话好好说》和《爱及其他》中的奥利弗等,他们虽然生活在英格兰,法语却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法语的运用当然不是为了增加阅读难度,更不是炫耀。事实上,那些法语并不会对小说的阅读和理解造成实质上的阻碍。当然,巴恩斯不用法语似乎更在情理之中。那么,在我们看来这些法语并非非用不可,巴恩斯却为何非用不可呢?这主要涉及语言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关系。巴恩斯通过《地铁通达之处》对此做了较为充分的阐释。在

①Barnes J. *Metroland*. London: Picador, 1990, p. 124.

②Barnes J. *Through the Window*. London: Vintage, 2012, pp. 181-182.

③朱利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石雅芳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④朱利安·巴恩斯:《亚瑟与乔治》,蒯乐昊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⑤Jeffries S. “It’s for Self-Protection”, *Conversation with Julian Barnes*. Ed. Vanessa Guignery and Ryan Roberts.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2006, p. 131.

⑥Lewis G. “Julian and Arthur and George”, Powells. Com, 2006-02-13.

小说里巴恩斯提到一个语言实验,其实验对象是嫁给美国士兵的日本女性,英语和日语是她们生活中所用的两种语言,她们被采访了两次,分别用日语和英语。结果显示,“讲日语时,这些妇女会意识到紧密的社会关系的价值,表现得顺从、配合。讲英语时,她们变得独立、直率,而且更加外向”^①。这充分表明语言不仅只是一种交流工具,而且与文化认同和民族品性密切关联,它左右和塑造着语言的使用者。主人公克里斯的变化也是证明。主人公克里斯去巴黎之前常与好友托尼使用法语交流,到了巴黎后更是每天使用法语,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自己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像法国人一样运用肢体语言:“我开始打手势……我用指背划过颌边表达感觉无趣。我学会耸肩的同时两嘴角做出朝下动作。我将手指交叉在腹部,手掌朝内,然后两大拇指向外弹出,同时用嘴皮发出扑扑的声音。”^②以此观之,巴恩斯深知语言与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巴恩斯在英语创作中加入法语既是对传统英格兰身份认同的挑战,同时又表明了以法国文化借鉴为突破的文本姿态。

对法国文学的借鉴是巴恩斯跨越写作更为重要的表现形式,而《福楼拜的鹦鹉》堪称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它不仅多处关涉福楼拜的文学,更有对其作品的仿化和借用。《公认概念词典》是福楼拜所作,《福楼拜的鹦鹉》不仅探讨了这部作品,说它是一门“讽刺课程”^③,而且还在小说的第十二部分以它为模板,选取了与福楼拜有关的人物和事物作为词条进行了解释,取名为“布莱斯维特的公认概念词典”,其风格也体现了福楼拜式的“讽刺”。福楼拜的名著《包法利夫人》与小说关系更加密切。主人公布莱斯维特及其妻子艾伦的情感问题是以《包法利夫人》为原型构建的:与爱玛一样,艾伦情感不忠,与他人有染,这让布莱斯维特痛苦不堪。不仅如此,《包法利夫人》还是布莱斯维特想象妻子出轨行为的蓝本,以及其理解生活和个人痛苦的重要参考。也就是说,巴恩斯将小说虚构人物布莱斯维特的情感和生活与福楼拜的文学密切关联起来,形成一个不可切割的

整体。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巴恩斯文学与法国文学的互动关系和亲密联系。

巴恩斯的跨越写作并非提倡法国化,事实上,巴恩斯反对各种形式的同质化。他曾经表达过对美国化的担忧:“我觉得遗憾:语言在消失,文化在消失,是否会在某时出现一些奇怪的遗民装作英格兰人,就像威尔士人集在一起,穿着像德鲁伊特信徒。大家将会使用一种通用国际英语(a shared international English),然后,在美国英语最终统治世界之前,会有一小群人聚集在一起,保护所有存在于英国英语中的古老差异。我想这会在一百年后发生。”^④同样,他认为英法差异也是必须的,哪怕是出于“生物多样性”,“也应该留存”^⑤。小说《地铁通达之处》也表达了对法国化的否定。主人公克里斯在巴黎一段时间之后,意识到自己的变化,开始对此有所警觉:“我发现归纳概括对我更容易了,也更容易贴标签、打勾、分类、分割、解释,并且更容易明晰了——天啊,是的,容易清晰了。我感到内心翻腾;这不是孤独(我有阿里克),也不是想家,而是与做英格兰人(being English)有关。我还感觉我的一半好像不忠诚于另一半了。”^⑥法国化让克里斯颇为不安,他想重新找回做英格兰人的状态,所以不再像刚到法国那样避讳自己的同胞,而是渴望见到他们。他在莫洛博物馆遇见几个英格兰人,便主动接近。这些英格兰人中就包括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马瑞恩,而她吸引他的原因正是她身上体现出来的英格兰性:她“没有任何化妆”^⑦(象征英格兰人的简单和直接);“没有什么习惯性的动作情态——无论她说什么,她都保持平静、直接、公开和敞亮”^⑧。这些久违的英格兰特性让他心动,他选择马瑞恩也表达了对法国化的拒绝。

巴恩斯的文学也始终坚守英格兰文学的民族个性,不仅《地铁通达之处》《凝视太阳》《有话好好说》《亚瑟与乔治》等有关英格兰的小说如此,即使有“福楼拜的另类传记”之称的《福楼拜的鹦鹉》也如此。《福楼拜的鹦鹉》的大量篇幅虽然是关于福楼拜的,但体现的则是英格兰民族性格和

①Barnes J. *Metroland*. London: Picador, 1990, p.124.

②Barnes J. *Metroland*. London: Picador, 1990, p.123.

③朱利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石雅芳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④Fraga X. "Interview with Julian Barnes". *Conversation with Julian Barnes*. Ed. Wanessa Guignery and Ryan Roberts.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2009, p.143.

⑤Barnes J. *Something to Declare*. London: Picador, 2002, p. xvi.

⑥Barnes J. *Metroland*. London: Picador, 1990, p.124.

⑦Barnes J. *Metroland*. London: Picador, 1990, p.128.

⑧Barnes J. *Metroland*. London: Picador, 1990, p.129.

思维习惯。像小说中提到的英格兰牧师马斯格雷夫一样,巴恩斯对“细枝末节极端关注”^①,写下的大都是关于福楼拜的“细枝末节”,比如关于包法利夫人眼睛颜色的讨论,关于福楼拜日常乘坐火车的记载,还有对福楼拜与各种动物关系的探讨,甚至连有关福楼拜的文学试题也不放过。对此,有不少评论者认为《福楼拜的鸚鵡》对琐事和细节的关注是对宏大叙事的反动,但如果结合民族身份认同进行考察,有理由认为,强调具体和细节正是巴恩斯对英格兰性的认同和坚持,也正是这种在写作法国事物和人物中坚守民族身份造就了《福楼拜的鸚鵡》的独特魅力。

关于巴恩斯小说与法国文学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巴恩斯作品总体上好像在重复与不同之间摆动,在对过去文学的意识与希望超越和创作新的、杂糅的东西之间摇摆。他完全没有受限于法国文学的传统或受制于过去的传统,而是设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创造自己的形式。”^②其实,所谓“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创造自己的形式”,并非只

是源于法国文学传统的影响,更是对英国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巴恩斯虽然借鉴了法国文学经典,但体现的仍是英格兰的民族个性和文学文化传统,这正是巴恩斯小说创新的魅力所在。他的小说在法国受欢迎,也并不是因为其作品的法国化,“不是因为法国人已经把他视为他们作家中的一员了”,而是因为他“太英格兰了”^③。

结论

巴恩斯的法国情结让他形成了有别于英格兰传统观念的法国认识,并以此审视和反思英格兰性,其宗旨并非法国化,而是要打破英格兰传统民族认同的“沙文主义”^④和狭隘心理,在文化包容和互相借鉴的心态下关注差异,重塑英格兰民族自我。他的“跨越”写作将法国文学和文化影响融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创造出既与法国文学、文化密切相关,又坚持民族文化特性的英国文学佳作。

Julian Barnes's Francophile Complex and His Reflection on Englishness

LI Ying & LI Hui-f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Many of Julian Barnes's novels take France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define and reflect on Englishness. With his Francophile Complex, the English are dwarfed by the French in terms of character, ways of thinking and artistic aesthetics, which contradicts the traditional English self-image. Actually, what Barnes seeks is a reflection of the narrowness and limitation of traditional Englishness rather than a selling of “French”. Through his “cross-writing”, Barnes integrates French influence into his insistence of English literary tradition, and creates innovative works with a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ulian Barnes; Francophile Complex; Englishness; reflection

(责任校对 朱春花)

①朱利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鸚鵡》,石雅芳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

②GuigneryV. “‘A preference for things Gallic’: Julian Barnes and the French Connection”. *Julian Barnes*. Ed. Sebastian Groes and Peter Childs.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p. 49.

③HolmesF. *Julian Barn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19.

④MoseleyM. “Crossing the Channel: Europe and the Three Uses of France in Julian Barnes's *Talking It Over*”. *Julian Barnes*. Ed. Sebastian Groes and Peter Childs.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p. 74.